

沪盟寻踪

编者按

民盟上海市委已建立 14 处民盟传统教育基地,这些历史悠久的建筑,不仅是民盟发展历程的见证,更是上海城市记忆的一部分,其中许多已经纳入了市政府“建筑可阅读”名录。然而,与民盟有关的上海老建筑远远超过这个数目,它们像珍珠般散落在城市的各个角落,等待着我们去探索和讲述它们的故事。

为此,民盟市委今年将举办首届上海民盟传统教育基地讲解员比赛,这不仅是一次比赛,更是一次深入学习和体验的机会。比赛通过沉浸式的学习体验和共创式的专业培训,旨在帮助广大盟员深刻理解民盟的光辉历史,从而培养出一批优秀的“盟史讲述者”。

本版特开辟“沪盟寻踪”专栏,循迹老建筑,回眸历史,感受上海民盟的发展脉络和这座城市深厚的文化底蕴,欢迎盟员们积极投稿。本期,让我们一同回顾民盟市委机关所在地的变迁历程。

建言献策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的时代背景下,实现科技创新、产业进步和金融发展有机结合,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2021 年 12 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实现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2022 年 12 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对此予以强调。近年来,我国在推动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但仍存在三大堵点。

一是科技创新能力不强。当前,我国科研投入以补贴式投入为主,研发强度整体相对不足。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3 年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强度仅为 2.64%,较西方科技强国 3%-4.5%的研发强度还存在较大差距。科研费用支出中基础研究占比仅为 6.65%,与发达国家普遍 15%以上的水平相比差距明显。

二是科技产业与产业发展脱节。一方面,目前我国国家级和地区级的重要研发中心、工程技术中心和检验检测中心主要设立在科研单位和国有企业,此类单位内部对于科技创新的知识产权归属权、使用权等都缺乏清晰的界定,部分科技创新成果难以有效产业化;另一方面,我国底层技术领域对外依赖度较高,产业发展对科技创新的反哺作用尚未发挥。

三是金融体系对科技、产业的服务能力不足。我国资本市场吸纳长期资金的能力不足,影响了科技创新的长期资金来源。企业创新形成的产权证券化程度不高,金融对建立科技创新的资本激励机制、风险分担机制的作用发挥还不够。

之所以出现上述问题,其根本原因还是没有很好解决“看见”“看懂”和“信得过”问题。

科技、产业、金融是三个有所关联但相对独立的领域。这三个领域有不同的

南京西路与陕西北路交汇的宽阔路口,不仅有大上海繁华的地标,更浓缩了这座城市的历史印记。这个独特的十字路口仿佛是一幅生动的时代画卷,一侧映射着商业的璀璨与繁华,另一侧则诉说着历史的沉淀与变迁。民盟市委自 1946 年起,从南京西路至陕西北路,数易其址,每一次搬迁不仅是地理位置上的转移,更是上海民盟发展历程中的一个缩影。

从南京西路启航

1945 年 12 月,沈志远和黄竞武受民盟中央委托,肩负着筹建民盟上海市组织的使命来到上海。他们携手盟员肖秉铨、谢仿林,在静安寺路(现南京西路)南海花园三楼设立临时筹各处,开展民盟的活动,并开始吸收新盟员。1946 年 6 月,国民党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在这一关键时刻,民盟总部为反对大规模内战,委派中央常委黄炎培、沈钧儒和梁漱溟等人来沪开展活动,而南海花园饭店便是他们的主要活动场所。作为沪上主流媒体的《申报》,曾多次刊登南海花园饭店的广告,从这些广告的内容中我们可以窥见,饭店不仅以“川菜”闻名,还经常在夏季举办“吃茶,乘风凉,跳舞,听音乐”等海派风味十足的休闲活动。更为重要的是,南海花园饭店还承担着民主人士召开新闻发布会的重要功能。在 1946 年第 17 期《周播》周刊的头版头条中,一则关于罗隆基的新闻曾引发广泛关注,标题为《罗隆基不想上庐山 却在南海饭店发空论》。尽管这份国民党控制的小报对民盟和罗隆基进行了嘲讽和污蔑,抨击民盟是“共产党的应声虫”,但这恰恰凸显了当时民盟与中共之间亲密合作的关系。

1946 年 8 月,民盟上海市支部正



20 世纪 80 年代初,谈家桢主委(一排左二)在荣宅与王丹凤(一排左一)等盟员亲切交谈。

式宣告成立,并将南海花园饭店作为争取和平民主斗争的重要据点。1947 年,南海花园饭店的主人,地皮大王周纯卿因心脏病突发猝死,著名律师、民盟中央常委史良承办了周的遗产案。根据当时上海律师公会的规定,律师可收取当事人财产的千分之五作为公费,但周的亲属因无现款,便将这座三层房产赠予了史良。上海解放后,史良毫不犹豫地房产转交给民盟。如今,南海花园饭店已不再是昔日的政治活动场所,而是成为上海市民欣赏评弹艺术、享受文化生活的休闲之地。

1958 年,民盟与民革、民进、农工党、九三学社、台盟共同迁至外滩山东一路 15 号,开启了民主党派合署办公的先河。时任民盟市委主委陈望道,曾在此为盟员讲述翻译《共产党宣言》的往事。外滩 15 号,这座见证了上海城市变迁的

历史建筑,曾是华俄道胜银行大楼。上世纪 50 年代,这里又成为上海航天局的办公场所。如今,这栋大楼已华丽转身,成为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所在地,继续书写着上海经济发展的新篇章。

在陕西北路恢复活动

陕西北路素有南京西路后街之称,是上海仅有的三条“中国历史文化名街”之一,原名西摩路,1914 年筑成,是一条百年老街,也是上海 64 条永不拓宽的马路之一。这条历史悠久的街道两旁,矗立着名人故居、风格鲜明的建筑和革命遗迹等 21 处历史文化景观。

1977 年 7 月,上海各民主党派在泰兴路 306 号市政协文化俱乐部临时办公,为恢复活动做准备。1979 年,民盟市委迁至陕西北路 186 号荣宅。荣宅,这座曾属于“面粉大王”荣宗敬的故

居,成为了民盟市委的“新家”。据机关退休老同志回忆,荣宅二楼有一个铺着柚木地板的宴会大厅,彼时作为各党派共用的机关礼堂。那时,民盟市委经常在那里开茶话会,名家齐聚,高朋满座,像名医黄铭新、音乐家谭抒真、儿童文学家陈伯吹、电影演员王丹凤、篆刻书画家钱君匋等都常在这里参加活动,氛围热烈而融洽。

当时,在陈望道、苏步青、谈家桢的领导下,上海民盟从三个方面着手开展工作。首先,重塑机关工作架构,1979 年民盟市委机关设立了秘书、组织、宣传三个处,不久,秘书处改为办公室,组织处、宣传处改称为组织部、宣传部,并增设社会服务部,负责咨询、办学、支边、支农以及老年盟员等工作。其次,加速恢复组织发展,从 1977 年到 1987 年的十年间,盟员人数从 2351 人增长至 5671 人,盟员人数增加了一倍多。第三,积极推进参政履职,聚焦教育改革、浦东开发、宝钢建设等战略层面的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上海的重大工程和重要政策的实施提供了有力支持。

1988 年,民盟市委再度迁至北京西路 860 号市政办公。荣宅则于 2002 年被传媒巨头默多克相中,签下 10 年租约,成为星空传媒的办公地点。2011 年,意大利时尚品牌 Prada 出资荣宅修缮工程,历时六年修旧如旧,2017 年底重新向公众开放,迅速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和网红打卡地。各党派市委机关的老同志们也纷纷回访荣宅,寻找当年的记忆。

从陕西北路再出发

现坐落于陕西北路 128 号的上海民主党派大厦,是全国第一幢省级民主党派集中办公的大厦,从地理位置上看是当年荣宅后花园凉亭的所在地。历史总是有太多巧合,据民革中央副主席贾

亦斌回忆,1948 年 12 月至 1949 年 4 月间,他在浙江与上海之间频繁往来,与中共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员会建立联系,并在上海设立了两处秘密联络点,其中一处便是陕西北路 128 号。在《1949 年嘉兴起义始末》等多篇文章中,贾亦斌多次提及这个地址。可以说,陕西北路 128 号不仅是上海统一战线的地标,还是历史上嘉兴起义的谋划策源地之一。

1992 年 12 月 26 日,民主党派大厦正式奠基。1995 年 11 月,民盟中央主席费孝通、民进中央主席雷洁琼等视察了即将落成的民主党派大厦。1996 年 12 月,民盟市委迁至民主党派大厦 14 楼,2004 年 8 月又迁至 18 楼。在机构设置上,1995 年 12 月增设了联络部,形成了“四部二室”的工作机构布局,包括组织部、宣传部、社会服务部、联络部以及办公室、研究室。2007 年,为了加强参政议政工作,原联络部被调整为参政议政部。这一机构设置沿用至今,确保了民盟市委工作的高效运转。

2016 年,为了提升设施水平和扩展功能,民主党派大厦启动了全面的修缮工程。在改造期间,民盟市委曾在太原路 294 号的中科院上海分院临时办公一年。2017 年,经过修缮与改造,民盟市委又回到陕西北路 128 号 17-19 楼办公。上海民盟组织从解放前的 500 多人发展到如今拥有 24000 多名盟员的省级地方组织。历史上还涌现出陈望道、苏步青、钱伟长、谈家桢、李国豪等 40 多位知名大学校长,谷超豪、胡和生等 21 位“两院院士”,沈志远、熊佛西等 21 位“上海社科大师”以及刘海粟、赵冷月、万籁天、王丹凤、丁是娥、戴雅仙等众多文艺大师。如今,上海民盟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沿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继续前行。

(作者系民盟市委宣传部四级调研员)

促进科技、产业、金融实现良性循环

肖本华

如何推动科技、产业、金融实现良性循环?

一、要构建稳定、多元、长期的科研投入体系,强化基础科技创新。

在科研投入的资金来源和结构上,要形成企业资金、政府资金与其他社会资金共同参与、各有侧重的投入体系,积极打造政府资金以基础研究为主、应用研究为辅,企业资金以实验发展及应用研究为主、基础研究为辅,其他多元社会资金均衡投入为特征的科研投入资金结构。

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打造产学研一体化体系,优化科研投入的行业结构,鼓励计算机、通信和电子设备、汽车、医药、设备制造等行业持续强化科技创新,改变目前我国科研投入中制造业占绝对主导地位的结构,加速弥补非制造业尤其是科学研究发展服务、计算机系统设计及其他专业科技技术服务研发投入不足的短板。

二、要系统性解决“看见”“看懂”和“信得过”的问题。

针对阻碍科技、产业、金融实现良性循环的“看不见”“看不懂”和“信不过”等问题,应从科技端、产业端、金融端同时发力,解决其内在驱动力不足、缺乏有效链接渠道和能力不足等问题。

在解决内在驱动力方面应采取两方面措施。一是加快推进分类科研评价体系改革,构建新的激励机制,营造更加宽松的学术环境,既要让一部分科研人员坐得住“冷板凳”,做更前沿、更具挑战性的基础研究;又要鼓励一部分科研人员从事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着重评价其技术创新与集成能力、取得自主知识产权的转化运用情况和对产业发展的实际贡献。二是要进一步推动金融回归本源,提高金融机构主动服务实体经济的积极性。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金融是实体经济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

是金融的宗旨,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的要求,各类金融机构应把为实体经济服务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提高服务科技创新和产业的主动性。

在解决有效链接渠道方面也应采取两方面措施。一是推进科技成果产业化平台和产融对接平台的建设。在这两个平台建设中,以成果库、需求库、服务库为基础,建立以信息匹配为核心的组织方式和围绕技术转化为核心的垂直服务模式,把院校及科研机构的技术能力、企业的市场需求、金融产品和服务信息对接起来,解决三者之间的“看见”和“看懂”问题。二是要推进新型科技创新主体的建设。近年来的国内外实践表明,新型研发机构、大企业开放创新中心、孵化器是有效链接科技端、产业端和金融端的重要方式。

在解决能力不足方面则主要是大力培养战略科学家和产业投资专业人才。一是要大力培养和使用战略科学家。战略科学家既是科学家,更是战略家,是科技人才中的“帅才”,是引领科技前瞻布局、带动重大领域创新的“关键少数”,是中国科技实力实现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核心力量。在重大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项目中,战略科学家在解决“看懂”“信得过”中可以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二是要大力培养和使用产业投资专业人才,科技企业、金融机构和政府部门都需要一定数量的产业投资专业人才。如近年来安徽省合肥市通过定增投资京东方、联手战投引入长鑫、专项基金投资蔚来等,在实现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上创造了“合肥模式”,其成功经验之一就是打造“政府投行队伍”。

(作者系民盟市委金融专委会副主任、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立信研究院副院长)

终身学习:构建大学与社区互利共赢的合作纽带

侯定凯

大学与所在城市社区历来相伴而生,两者不仅在空间拓展上如影随形,而且在文化生态上成就彼此。随着上海高等教育走向深度普及化,大学需要考虑“谁是明天的大学生”这样的问题,而城市可持续发展、社区治理、人口发展等方面的挑战,也离不开高等教育方案。为此,大学与社区需要寻求更广泛、富有成效的协同共进机制。当前,弥散于城市各个角落的终身学习文化,可以为大学与社区实现互利共赢提供良好土壤。

毫无疑问,大学拥有服务社区终身学习的长久传统。无论是以“请进来”方式举办的老年大学、继续教育机构,还是以“走出去”方式开展科学普及和文化传承的社区志愿者活动,无不体现了大学使命中的人文性、社会性维度。不过,这些实践大多强调从大学到社会的单向知识输出,且远离大学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核心业务”。翻开各大学的战略规划文件,我们鲜见关于学校与社区如何开展知识共建共享、推进市民终身学习方面的表述。大学教师利用专业特长参与科学普及、传统文化传承、社区人文环境改善等方面的工作,依然是被边缘化的学术活动。而大学依然缺乏将终身学习服务与教师日常工作相结合的制度安排和激励机制。

高质量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城市建设,离不开大学的深入、广泛参与。联合国面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提出“确保包容、公平的优质教育,促进全民享有终身学习机会”,高等教育的包容性发展是其中一个子目标;可持续发展目标还提出“建设包容、安全、有韧性和可持续的城市和社区”。国际上,越来越多的大学明确将社区终身学习纳入学校的发展战略,并落实到日常育人、科研和社会服务中。拥有广泛影响力的美国卡内基高等教育机构分类体系,已将大学社区参与作为一个单独分类体系加以评估,以倡导大学与社区建立基于知识和资源交流的互惠互利关系,而终身学习是评估指标之一。随着终身学习成为社会的一种新常态,大学亟待创新机制和途径,以终身学习为纽带,构建与城市社区更加紧密的关系网络。

例如,大学可以与社区合作开发更多“产销对路”的终身教育课程和项目。在上海,针对基层治理队伍能力提升的现实需求,一些城区“春江水暖鸭先知”,协同区相关职能部门,依托辖区内的社区学院,成立了社区治理学院,提供社区治理热点问题会诊和常态化人员培训的开放式平台,开设的课程完全为基层干部量身定制,并根据学员反馈动态调整,着力为社区治理育能人、开新方。项目一经推出即刻得到了社区干部的广泛响应和赞誉。比较而言,社区内的大学生在及时感知、积极回应社区学习需求方面步伐迟缓,面临的体制和机制障碍不少。社区教育经验给大学的一个启示是:人才培养制度和课程创新,需要摆脱学术性知识生产的内循环,对城市和社区发展的

反应灵敏度,应成为评判大学社会贡献大小的重要参照。大学社区参与不是居高临下的思想和知识灌输,而是遵循平等交流、互通有无、合作共赢的理念,在校内外协作中解决社区的实际问题,并倒逼大学不断创新知识体系。

又如,大学可以拓展校园开放途径,发挥教育资源的溢出效应。长期以来,大学校园如何向社会公众开放,时不时会成为舆论热议的话题;而敞开大门后,如何做好校园资源开放共享的“后半篇”文章,强化大学的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功能,不断提升学术殿堂的社会影响力和美誉度,又是大学管理者们的长久课题。近年来,报名火爆出圈的上海市民艺术夜校,反映出都市年轻人的学习热情,而公共文化场馆内夜校课堂“一座难求”的景象,也折射出当前城市终身教育供给的缺口。此时,大学可以主动作为,利用自身多样化的专业和丰富的师资,在校内开辟市民艺术夜校的新空间,重现上个世纪 80 年代渴望知识的年轻一代涌入大学夜校的“烟火气”。如此,大学不仅可以向社会展示开放、包容的良好形象,也能检验大学教育质量的成色,大学夜校课程是否一如校外机构那样受欢迎?与校外机构比较,大学课程的核心竞争力在哪里?在校大学生如何从夜校课程中受益?这些课程能否为大学教育改革带来契机?等等。

再如,大学可以在“公众科学”理念指引下,鼓励市民参与与科学家主持的科研项目,从中长知识、开眼界、学本领。与传统科普教育的单向知识扩散不同,在公众科学项目中,非职业科研人员(包括科学爱好者、社区志愿者等)经过适当培训,参与研究项目的数据收集、分类、记录、分析等工作。公众科学受到明确的科学问题驱动,通过提供亲身临境的科研实践机会,有助于提高参与者的科学兴趣、科学素养和公民参与意识。从国际范围看,公众科学项目已在生态与环境、生物学、教育、气候变化、计算机科学、医疗健康、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等领域广泛开展。但从科研成果看,有统计显示,我国学者利用公众科学途径发表的研究成果,大多来自非高校的科研机构,而国际上这一领域发文最多者来自知名大学。为了让公众科学项目惠及更广泛的人群,大学科研工作者需要在公众科学的价值认同、项目实施能力方面获得更多训练,政府部门也需要加强这方面的方向引领和制度保障。

一个日益庞大、多元、充满竞争的终身学习市场正在发展壮大。以文化传承和创新为己任的大学,是时候考虑如何在这一潮流中确立自身的独特地位和使命了,而问题的答案将在大学与城市社区的深度互动中浮现。上海正在大力推进“五个新城”建设,新城区域不乏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期待那里的大学能与新社区共同打造学习型城市的典范。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上海终身教育研究院副教授)

小中见大,践行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力量

吴大器

步伐,要在乐推企业文化的综合支撑上融入红色文化、海派文化的份量和综合文化素养,要在获得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传统制造型企业提质增效的创新系统的量化目标上,形成战略规划与方向,走向一个新的起点,走上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康庄大道。围绕“新质生产力”的深化探索,笔者有以下三点想法:

第一,要从浦东和临港地区发展战略出发,因地制宜,开展若干突破性重点行动,当好“开路先锋”。

“思乐得”企业地处上海浦东、临港地区的书院镇,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处上海浦东、临港等开放“前沿”的实体经济群体,应该当行动起来,加快中观层面的系统联动,把践行新质生产力的基础战场规划与浦东改革开放任务衔接、迭加,奏响“开路先锋”的英雄乐章。

第二,制造型企业弘扬国际化品牌战略,是“中国智造”更高、更快、更强、更科技”走向全球的核心标志。

中国制造业已经从“制造”转型为“智造”,享受了科技研发的红利,弘扬国际化品牌战略体系会成为核心标志。这里有三个着力点:一是聚焦并抢占某一产品的国际“奥斯卡”并形成系列特色品牌,中国制造业要形成国际品牌的“万紫千红”形态;二是突出在产品的设计、拓展上的“做精、做优、做特、做异”,以科技研发和精品设计、创新销售为“四做”塑造基石。三是渐进推行全球五大洲的产品系列差异化设计布局,巩固已有市场占有率、开发差异化、辐射型、多功能沿线的多频生态、生活型、科技新型的产品设计。

第三,中小型企业制造型企业要在践行新质生产力的征途上,深化战略视野,确立企业四个维度的发展行动计划,为现代企业体系化框架。

建议具有相应基础的中小型企业,要从自身实际出发,主要在四个维度上构筑起新质生产力的现代践行体系。一是经济保障维度的高度。以经济成

效的既定目标作为先进生产力的核心标准,确定 3 年、5 年、8 年的量化经济目标。

二是科创集成维的深度。以产品特色,沿伸上、下游及其科创共同体建设集成为先进生产力的质量标准,规划未来的科技含量卓越程度。

三是文化环境维的温度。以企业所处的环境条件,练好企业精神素养的内功,试验并提升上海企业、社会文化环境和民族文化、海派文化、开放文化的创新融合,作为先进生产力的社会标准。

四是国际品牌维的宽度。以既有的国际化品牌为基础,拓展特色产品持续获得国际品牌奖项的频次、拓宽适应特色产品面向全球各大洲的市场需求,沿伸销售,作为先进生产力的国际标准。从而,为国家新质生产力的基业、增添包括中小型企业制造型企业在内的相应贡献。

(作者系上海金融区区域经济发展创新枢纽首席教授、原上海市政府参事)